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统制政策研究

杨建中, 刘梦苑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太原 030024)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后开始推行粮食统制政策,此政策的实施,不仅化解了粮食危机、保障了军粮供应,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太行抗日根据地;粮食贸易;粮食统制政策

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4-0043-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4.007

Research on the Grain Control Policy in Taihang Base Area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G Jian-zhong, LIU Meng-yuan

(School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aihang Base Area began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grain control after arduous exploration, which not only resolved the food crisis and guaranteed the supply of military food, but also greatly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base area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 Words: Taihang Base Area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grain trade; grain control policy

粮食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受战乱与天灾的影响,各抗日根据地均不同程度存在着粮食匮乏的问题。学界对于抗日根据地粮食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根据地的粮食工作和粮食政策^①。但既往研究较少从粮食统制的角度分析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故本文对太行抗日根据地

粮食统制政策进行考察,以探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此政策来保障民生、坚持抗战的。

一、粮食贸易政策的演变

太行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也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是华中、山东根据地同延安联络的重要交通要道。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政策,大体经过了完全

作者简介:杨建中(1964—),男,山西沁源人,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梦苑(1998—),女,宁夏石嘴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① 相关研究有:魏宏运《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王明前《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研究》,《党的文献》2016年第1期;黄存林《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粮食斗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管制、贸易统制、统制与市场相结合三个阶段。

(一) 完全管制

1940年以前,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了牵制日军,我党对敌占区实行了严格的完全管制贸易政策。此时财政和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筹集粮食和资金上,粮食贸易的重要性未得到足够重视。在粮食贸易上采用的是“阻”的办法:一是不承认伪币;二是禁止边区粮食出口,不与敌占区开展贸易。如,冀太联办(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规定:“不准运输粮食,发现偷运,一律扣除。”^[1]不可否认,这种对粮食完全管制的办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应,对根据地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党缺乏对敌经济斗争的经验,没有制定出一套与当时形势相适应的完整的对外贸易政策,这种“一刀切”式的限制,导致太行区长期形成的“西粮东进”的通道被人为切断,粮源变得更为紧张,太行区东部的粮价持续走高,粮食走私偷运十分猖獗^[2],而且走私导致大量粮食流入敌占区,反而加剧了根据地的粮食困难。

(二) 贸易统制

粮食贸易的重要性随着敌我双方实力的变化越来越突出。1940年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粮食贸易政策的分水岭,这一年针对早期根据地完全管制政策的不尽完善之处开始进行调整。在1940年4月召开的黎城会议上,中共中央北方局确立了“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经济与贸易政策,这是粮食统制政策的开端,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贸易发展指明了方向^[3]。其中,“对外统制”是指商品贸易的主导权控制在根据地党委手中,根据地的出口贸易必须在根据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商品的出口必须换回根据地所需的必需品;“对内自由”是指除特别规定的违禁品外,在根据地内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4]¹²⁹。

太行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粮食专卖,改变了以往严禁粮食出口的限制。1941年8月,冀太联办发布《特许生产贸易总局在林北专理经营粮食出口的指示》,其目的是破坏日军征粮、抢粮的计划,保护根据地的粮食资

源,解决军民吃饭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根据地的必需品^[5]。

经过一年时间的探索,太行抗日根据地于1942年春规定,在一定区域内可以凭证购粮和运粮,取消私人银行,使冀币与农村社会商品产生联系。此举稳定了粮价和冀币币值,扩大了冀币的流通范围,严厉打击了伪钞。同年5月,边区政府又发布《粮食出口专卖兑货》的命令,规定在磁县设立谦记客栈,由彭民负责经营管理,借以打破日伪政府的物资统制配给制,促进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换^[6]。以上这些措施逐步完善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统制政策,使根据地在粮食斗争中获得了主动权。

(三) 统制与市场相结合

1943年,随着各项政策的日趋完善,太行抗日根据地对日军的粮食贸易斗争变得灵活且有效,对内,把粮食贸易和货币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又把粮食斗争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对外,将货物的进出口进行弹性安排,打破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保护和增加根据地的资源,提高根据地冀币兑伪币的汇率。同年,根据地在贸易统制的基础上开始利用市场,采取统制与市场相结合的粮食统制政策。4月4日,太行区发布《粮食调剂管理暂行办法及注意事项》,明确规定:“凡在本地之人,无论在敌占区还是在游击区,都可以自由买卖粮食。”^[4]¹⁵⁰7月,根据中共太行分局的决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撤销粮食管理办法实行根据地粮食贩运贸易自由的命令》,其中规定:“恢复粮食自由集市,根据地内粮食买卖贩运完全自由。”^[7]¹⁰²³由此,太行区以粮食交易为主的集市贸易开始蓬勃发展。9月14日,边区工商总局发布《关于培养合作社担任调剂内地粮食任务的指示》,逐步改用合作社组织粮食调剂^[8]。

1945年,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为解决群众售粮困难和棉花、土布、食盐等物资供给不足的难题,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发出《边沿区各合作社准予组织粮食出口并准许商店存粮出口兑换棉花食盐》的指示,特别准予边沿区收成好的地区,由合作社组织粮食出口,以换取棉花、

土布、食盐等物资^{[7]1045}。至此,粮食统制政策基本成熟。

通过对粮食进行统制,太行抗日根据地在粮食管控中从被动转为主动,不仅掌握了粮食资源,而且防范了日伪军的抢掠,使粮食成为打破日军封锁的强大武器。

二、粮食统制政策采取的具体措施

抗战时期,粮食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在太行区,日军一边进行军事攻击,一边大肆进行粮食掠夺。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障,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想象的。”^[9]因此,为保障军民粮食供给,在经历了最初对粮食的完全管制后,1940年以黎城会议的召开为起点的粮食统制政策开始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逐步施行,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利用金融杠杆,将粮食战与货币战相结合

1943年后,太行抗日根据地开始利用金融杠杆把粮食斗争与货币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冀南,日军一面捣乱破坏冀钞,一面又捣乱破坏法币。日军利用其所占据的据点和工业大城市,进行大量的伪钞销售,对冀钞造成了很大的冲击。”^{[10]284}对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适时提出:“反对伪钞,既要在经济上,又要在政治上。要禁止伪钞,要发展经济,要打通各根据地之间的商业关系,要对敌占区以货易货。”^{[4]128}

为反对伪钞,太行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有力措施进行应对:用伪币高价收购冀钞,同时在西部使用伪钞购粮,这使得西部粮食价格迅速上涨,伪钞币值下跌;而用冀钞所购粮食价格迅速下降,冀钞币值上涨,群众开始抵制使用伪钞,从而打破了伪钞的优势地位,同时使我方在粮食收购斗争中取得优势。

粮食统制政策实施后,在太行区西部,根据地对粮食资源进行有效控制,挫败了日军劫粮企图;在太行区东部,不仅从粮食销售中获利,而且使冀钞的可信度大大提高,其流通面也随之扩大^{[7]711-712}。由此,根据地不仅在争粮、争

钱上取得了主动,而且掌握了大量的粮食,换取了大量的外汇。这说明粮食在战争中发挥了金融杠杆的作用。

(二)运输粮食,救济灾民

1941年,太行抗日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1942年灾情覆盖面逐步扩大,到1943年受灾范围几乎涵盖了太行和冀南的绝大部以及太岳的大部。灾荒发生后,在调拨粮食时,根据地逐渐意识到,组织灾民运输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救济方法。灾民通过运输粮食得到运费,既可以自食其力,又可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于是边区政府于1942年10月发布《关于组织转运救济灾民的命令》,特别强调:“应尽可能地照顾穷人、无牲畜力的人,以确保有更多的运输机会。”^{[11]463}

在太行灾区,各专、县救援委员会组织灾民组建专门的运输队运输粮食,并根据灾民的物质条件和身体条件等实际状况,给予相应的支持和照顾。救援委员会的干部向灾民详细介绍了加入运输队将获得的报酬:“两天一个来回,至少挣7块钱。”^{[11]626}救援委员会还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措施:合作社在未征得脚价的情况下要先给灾民发放借贷,以照顾灾民,让他们补充体力;在运输线上,每隔30里,要安排一家粮店作为招待站;运输一斤做熟的米粮,能多挣一角钱。由于太行区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必须调剂更多的粮食以保障灾民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于是救援委员会将西部富余的粮食向灾区进行调配。同时,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提高粮食自给能力,救济更多的灾民。

(三)武装护粮,加强政治攻势

为确保粮食统制政策的顺利实施,太行抗日根据地积极与日军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

一是组织武装力量,打击日军抢粮行动。1942年6月1日,戎子和副主席在《对敌粮食斗争的策略和办法》中要求:“在敌占区和游击区,要坚决地反对灌仓,坚决地抵制强迫,并对日军的掠夺、吸收予以打击和摧毁。”^{[10]293}同时还提出:要加强警戒,对敌人的行动及时侦查,严防日军突然袭击,在必要时对某些较大的村落进行疏散;要“加强兵力,在围攻中进行游击

战,截杀敌人,抢夺日伪军的粮食,用于奖励民夫,把粮食抢运至根据地内,算缴纳的公粮”^{[10]293}。10月8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签发《反对日军抢粮政治训令》。10月14日,太行军区第四军区和军分区对粮食斗争的成绩进行总结,指出:“当前,由于党、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军主动进攻的政治攻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保卫了边陲地区的收成,完成了粮食储备计划,并推迟了日军的粮食储备。”^[12]

二是开展政治运动和政治宣传,揭露日军阴谋。首先,开展政治运动,揭露敌人攫取粮食的阴谋,让老百姓明白,日本及其占领的中国大城市粮食极度短缺,日军抢夺粮食,是为了将粮食集中到日本和被其占领的大城市里,必须抵制日军的这种恶毒行径。其次,对伪军和伪军组织开展宣传工作,告诫他们不要为日本人效力,“日本即将大败,要权衡形势,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不然抗日战争打赢了,老百姓就不会宽恕你了”^[13]。这样的宣传工作效果十分明显,尤其在1943年太平洋战争日本失败后,伪军和伪军组织的亲日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

三是军民联合,收粮打粮。根据地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对日军的征粮队进行打击,并组织民众对成熟的粮食及时收、打、藏、囤。总之,尽一切可能,让日军“连一粒米都不能带走”^{[4]955}。同时,根据日伪军晚上不敢出据点、不敢出碉堡的特点,八路军经常夜晚行动,将外地的粮食运送到根据地,交给边区政府。

三、粮食统制政策取得的成效

粮食统制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太行抗日根据地贸易的改善和发展,保证了根据地的粮食供应,保障了民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化解了粮食危机

一是合理调剂太行区东西两部的粮食供给,减轻灾民的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年底到1943年年中,边区政府除送去敌占区

和游击区12万石粮食以换取生活物资之外,还向灾区调拨了95790石^{[11]138-139},使灾民的粮食困难得到了极大缓解。

二是组织灾民运送粮食,增加他们的收入。如霍家山合作社曾组织卧虎庄极度困难的20位灾民执行运输任务,担盐到别处换取黄丝,然后将黄丝换成玉米,再将玉米换成棉花,最后将棉花交回工商局,每人每次可赚取16石玉米,由此保障了这些灾民在困难时期的生活^{[11]736}。组织灾民运送粮食,既帮助了灾民顺利渡过灾荒,又改变了根据地内粮食资源不平衡的局面。

(二)保障了军粮供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供应与战争胜负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云:“军无辘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14]可见粮食对于军队的重要性。确保军队的粮食供给是最复杂、最困难的一项任务,特别是在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在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通过粮食统制政策,保障了八路军的军粮供应。

一是一二九师主力在战斗进行了大量的军粮储备。据统计,1942年,该师三五八旅七六九团共开展了88次屯粮活动,对日军进行了45次伏击,掩护部队送粮23次,并在根据地内囤积了14098石粮食^①。

二是八路军及党政机关开荒种粮,减轻了地方粮食供给负担。1943年大旱过后,北方局总部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率领部队开荒种菜,滕代远参谋长领导总部种萝卜300多亩;一二九师政治部在一周之内栽种了60多亩蔬菜^{[11]160};太行军区部队从1943年冬至1944年春,共开荒十几万亩,人均3亩多;太岳大军开荒8万亩,人均也在3亩左右^[15]。

(三)促进了经济发展

一是粮食统制政策实施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商业得到恢复,新集市增多,小商小贩随即增多。鱼镇是冀西地区大宗商品交易的重要区

①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初稿)》,内部资料,1983年,159—160页。

域,1940年此地运销合作社、杂货铺、布店、面铺等商铺加起来有9家;1941年初经日军“扫荡”后市场遭到破坏,经过重建,1942年1月有运销合作社1个、粮店5个^[16]。1944年,据统计,太行区全区六个分区杂货业共计14850户、店房饭铺5620家^{[11]704},可见全区商业得到大幅度发展。

二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经济结构得以优化。首先农副业全面发展。为解决根据地军民吃饭问题,晋冀鲁豫边区在推广小麦、玉米、谷类等农作物种植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种副业,以推动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44年底,太行区药材出口180多万斤,其中左权县药材外销50万斤,价值360多万元^{[11]703}。这种农、副业全面发展的方式,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其次形成了以工带农、以工带工、以商带贸的产业格局。1943年12月,据边区工商总局统计,赞皇、临城、内邱、元氏、井陉、榆次、寿阳等20多个县,共有群众经营的作坊1202个,总投资7699万元;小手工业792处,总投资5121万元^{[7]1338}。除了大批的乡村市场建立起来之外,其他的行商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如平北县在抗战前有私营商业142处,总投资8520元;抗战时因经营方针正确,1941年增加到152处,总投资3.04万元^{[4]667}。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而且促进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统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特殊粮食贸易政策,对于妥善应对根据地粮食危机、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坚持抗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统制政策,是党根据抗战需要和人民的需要而制定的,这项政策的实施,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当今应对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 武昌祺. 山西粮食史话[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134.
- [2]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4册[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463-464.
- [3]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一:大事记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66.
- [4] 晋冀鲁豫财政经济史编辑组.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 [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46.
- [6]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山西通志·粮食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9:57.
- [7] 晋冀鲁豫财政经济史编辑组.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 [8] 赵秀山.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193.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8.
- [10]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册[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 [11]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2册[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 [12] 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5册[M]. 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5.
- [13] 郝平.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危机及应对[J]. 安徽史学,2016(6):93-102.
- [14] 孙武. 孙子兵法[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133.
- [15] 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下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812.
- [16] 徐建国.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解决“三农”问题研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4.

(责任编辑:李秀荣)